

教

育

# 略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

陈育辛

今年十月十八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。

陶行知先生的一生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代。在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解放斗争中，他始终与人民并肩携手，勇往直前。正是在革命斗争的风云中，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得到巨大的发展，成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。他丰富的教育实践和论著，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丰硕成果，是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的宝贵遗产。本文试就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，谈几点看法，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动是从一九一六年学成归国，担任南京高等师范教职时开始的，迄至一九四六年逝世，共约三十年。由于他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民族的热爱，早在留美期间和归国初期，就表现了他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优点和特色。他一踏上教育岗位，就显示出赤子的忠诚，战士的激情和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。这种宝贵的品质，使他跨出的第一步就十分坚实，他在给陶文溪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，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。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，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，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有很大的缺点。好在我的中国人性、平民性是很丰富的，我的同事们都说我是一个‘最中国的’留学生，经过一番觉悟，我就象黄河决了堤，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。”“中国的平民的路”，就是陶行知先生一生所走过的道路。而中国性、平民性，也正是他早期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。主要表现为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文化的深恶痛绝；鄙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，毅然抛弃为一般留学生所梦寐以求的大学教授职位，参加平民教育运动，戴着科学博士桂冠却心甘情愿编写《平民千字课》。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是难能可贵的。这种自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，值得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和发扬。

不过，陶行知先生早期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，带有朴素的性质。

大家知道，在阶级社会里，教育是有阶级性的，每一个教育家都不可避免地要过向政治。有的教育家以不同政治为清高，那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欺骗，就是由于政治上的天真。有的同志说，陶行知先生一开始就把教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。我们则认为，陶行知先生对这个原则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。

陶行知先生的青少年时期，曾经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；留美期间，师承杜威，甚得这位资产阶级教育家的赏识，受过“欧风美雨”的熏陶。因此，在他从事教育活动的初期，政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，教育思想上的实用主义影响，都是显而易见的。批评他曾经是个“教

育万能论”者、“教育救国论”者，自然未必恰当。如果说他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缺乏本质上的认识，一度过分夸大教育的社会作用，庶几是中肯的。他回国之初，面对百孔千疮的城市，凋蔽萧条的农村，以为只要兴办学校，运用教育的力量，就可改变一切。他立下宏愿：“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，征集一百万位同志，提倡一千万所学校，改造一千万个乡村，使中国乡村一个个都变成‘天堂’，都变成‘乐园’。”这里的“中国性”“平民性”表现得很清楚，改良主义思想也表现得很清楚。陶行知先生回国不久，参加了学制改革运动、收回教育权运动、职工教育运动、平民教育运动，都未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；他主持的“中华教育改进社”，只是以“调查教育实况，研究教育学术，力谋教育之改进为宗旨”，做的工作，主要也是选派社员出国考察，邀请专家来演讲，等等。再就平民教育运动的目的来看，也仅仅“在使全国四万万人中凡不识文字及缺乏知识之国民，普遍的得到补充教育之机会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的陶行知先生对旧中国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、不平等现象，尚无本质的认识。他只看到祖国贫穷落后，人民灾难深重，没有看到其根源；看到了平民、农民没有文化，看不到人民没有政治权利。总之，陶行知先生尚未认识到旧中国的教育，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，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，是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服务的。这就是传统教育、洋化教育的本质。要改造这种教育，就必须先有一个政治上的革命；要为人民大众争教育权，先得为人民大众争政权；要使人民大众成为教育、文化的真正主人，就得使他们在政治上当家作主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陶行知先生推行平民教育，提倡乡村教育、普及教育，打破了只有全日制学校教育才算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，使许多能够学习、愿意学习的人，不受地区、年龄、职业、家庭和经济条件的限制，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，把教育扩大到大众、社会，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了不起的创举，在冲击传统教育、洋化教育强加于劳动人民的种种枷锁上有着巨大的意义；他满怀为人民服务的热情，抛弃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的招引，脱下西装革履，换上短衫草鞋，到农村去，到农民中去，誓为农民“烧心香”，谋幸福，这种思想是崇高可贵的。但由于对教育的本质，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认识不很明确。因此，在教育怎样为人民谋利益问题上，带上改良主义的色彩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人民教育家在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发展过程。

可贵的是，陶行知先生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坚定的。他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作为真理的最高标准，为自己一切思想、行动的最高准则。正是这种与人民同呼吸，共祸福的精神，使他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摸索，执着地追求，“去找路线，寻方法，造工具”，以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。经过初期的曲折，到了晓庄学校被封的时候，蒋介石用屠刀把血淋淋的政治放到他面前。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了他，共产党人的鲜血照亮了他的眼睛，使他看清楚了：反动统治者是不容许任何人为人民做好事的，哪怕是教育上的一点改良也罢。从那时起，陶行知先生逐步明确了教育离不开政治，特别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，更使他不能不问政治了。于是他逐步地把“生活教育”运动与民族、民主斗争结合起来，“国难教育”、“抗战教育”、“全面教育”、“民主教育”的相继提出，表明陶行知先生已日趋自觉地将教育与政治联系在一起，成为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一翼。他在“一二·九”运动之后不久写的《民族解放大学》一文中说：“这个大学校没有围墙，万里长城还嫌太短，勉强的说，现在中华民国的国界就算是我们这个大学校的‘四至’。”“学校虽大，功课只有一门，这门功课叫‘民族解放教学做’。简单一点，它叫做‘救国教学做’。先生教什么？教救国。学生学什么？学救国。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陶行知

先生在这篇文章里，已经旗帜鲜明地批判了“教育救国论”，他说：“最近教育部通告里说‘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’这句话也要颠倒过来，才是真理。民族之生命即教育之生命，不救民族之生命，那能救教育之生命！这个大学校只救民族之生命，则教育自然有生命了。”他所拟订的“国难教育”目标规定：推进大众文化；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；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。并且亲自担任国民外交使节，出国宣传反侵略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他把“国难教育”推进为“抗战教育运动”；人民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，坚决提倡“民主教育运动”，他说：“民主教育，是教人民做主人，做自己的主人，做国家的主人，做世界的主人。”最后，陶行知先生不仅作为教育家，而且作为英勇的清醒的民主战士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，献出了整个生命。

这里，我们想补充一点：有的同志认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成熟于晓庄时期。我们认为根据上面所谈的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，把成熟期定为“国难教育”时期比较妥当。因为在此前，陶行知先生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尚带有朴素的性质，也正是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，他的教育思想才逐渐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，它的社会功能是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的。在阶级社会里，一定的阶级对自己所需要的人，都有一定要求。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教育家，都是根据自己阶级的要求，按照自己阶级的面貌来培养人的。因此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，在古今中外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陶行知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主张教育无目的论。杜威以前和同时代的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，在教育目的问题上，也都“怀抱琵琶半遮面”，羞羞答答，吞吞吐吐。他们有的主张培养“真善美的人”，有的说教育目的在于培养“纯粹的人”，也有人提出要培养什么“有理性的人”、“和谐的人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“无目的论”也好，培养这样那样的人也好，都是自欺欺人之谈。在阶级社会中，超阶级的人性、“纯粹的人”，是不存在的；所谓“理性”、“和谐”、“真善美”之类，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和阶级的内容。资产阶级教育家心目中的“真善美”的人，实际上就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、面貌塑造的“完人”。所有这些论调，无非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教育目的论的实质罢了。在我国封建社会里，国学、太学、府学、州学、县学等各级学校，都以孔孟之道为准绳，培养“忠君”的“为政”之士。孔子说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‘至善’”。这个“至善”，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道德标准，就是奴隶主、地主阶级的精神面貌。旧中国的传统教育，虽经戊戌变法期间的一些改革，“五四”运动前后提倡科学民主，反对尊孔读经，使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受到一定冲击。但是，教育制度、教育内容、教育方法上，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教育性质没有改变。这样的教育，仍然是剥削阶级的专利，为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服务，根据他们的目的进行人的培养。培养出来的人，不是“读死书、死读书、读书死”的书呆子，就是反动统治的爪牙，帝国主义的买办奴才。极少数例外的人，也只能在旧中国的瓦砾场上苦闷彷徨，无所作为。至于劳动人民，与其说是受教育，还不如说是被奴化。

那么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目的论是什么呢？他要培养怎样的人呢？在《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》一文中，陶行知先生说：“教师的职务，是‘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’。学生的职务，是‘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’。”什么叫“真人”？陶行知先生没有作专门阐述。但从他的有关论述中不难了解，“真人”就是“说真话做真事的人”。什么是真事呢？陶行知先生说，就是

“和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，争取真正民主实现，共同创造一个独立、自由、平等、进步、幸福的新中国”。在《育才学校创办旨趣》中，陶行知先生多处谈到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。这种人才，不做“人上人”，不要“升官发财”，而是从老百姓中来，回到老百姓中去，把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，为老百姓造福，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，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，帮助改造世界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。这样的人就是“真人”。我们不妨把这种“真人”说得更通俗一点，称作“为公的人”，或者叫做“公仆”，亦未尝不可。这样的人，具有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，是革命人民所需要的。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陶行知先生在教育目的上，在所要培养的人的面貌上，与一切剥削阶级分清了界线。

但是，这还不是陶行知先生的最高理想。陶行知先生教育目的的最高理想是培养“在劳力上劳心的人”。这样的人，显然是更完全意义上的“真人”。他在《在劳力上劳心》一文中说：“世界上有四种人：一种是劳心的人；一种是劳力的人；一种是劳心兼劳力的人；一种是在劳力上劳心的人。”劳心的人和劳力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陶行知先生说：“劳力的人专门在苦力上讨生活，无所用心，受人制裁；劳心的人专门在心上做功夫，成了高等游民，愚弄无知。”陶行知先生说的劳力的人，就是劳动人民，他们成年累月做苦力，温饱尚且不得，自然没有条件受教育，学文化，因而无所用心，受人压迫；劳心的人不事劳动，以愚弄劳动者为职业，在劳动人民看来，他们是高等游民。陶行知先生对于劳心、劳力的看法，显然是站在劳力者的立场上，对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的社会现象持批判态度。他反对劳心不劳力，也反对劳力不劳心，并且不赞成劳力和劳心并重，而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，以心制力。他说：“我们必须把人间的劳心者，劳力者，劳心兼劳力者一齐化为在劳力上劳心的人，然后万物之真理都可一一探获，人间之阶级都可一一化除，而我们理想之极乐世界乃有实现之可能。”这里，“化”就是教育。我们认为，仅仅依靠教育，是不可能使“劳心”、“劳力”、“劳心兼劳力”的人都成为“劳力上劳心”的人的。但他对劳力和劳心的关系的认识，“在劳力上劳心”的命题是唯物论的。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关于培养人的理想，并不是无根据的空想，人类原先本来就是在劳力上劳心的，既没有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，更无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的现象。这种现象是与社会的阶级一起产生的，当然也将与阶级一起消灭。到那时候，社会生产、科学技术高度发展，体力的作用日益降低，智力的作用日益提高，势必要求劳动者全面发展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力高度结合，成为“在劳力上劳心”的人。因此我们认为，陶行知先生所要培养的人，可以说正是社会主义新人。他的这种理想蕴藏着社会主义因素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在探讨行知先生教育思想时，人们常常提到他改“知行”为“行知”这件事。认为这标志着他认识论的转变。这无疑是正确的。但也有人认为，陶行知先生的“行是知之始”，是王阳明“知是行之始”的延续，半个斤斗并未翻出唯心主义的范畴。这样看待陶行知先生的认识论，我们认为并不符合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的实际情况。

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常识告诉我们，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；认识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，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证明。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，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，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标志。唯心主义则与此相反，把认识看做是人们心灵的创造和想象的产物。主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就是这样。他把一切认识的来源归结为“良知”，认为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。陶行知先生曾经相信这套“知行说”。因此

易名为“知行”。但这种错误理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。陶行知先生从自己的实践中发现这种理论颠倒了行和知的关系，是完全错误的。因此改名“行知”。应该肯定，陶行知先生用实践作为标准，来检验前人也检验自己的思想，敢于否定前人也敢于否定自己的理论错误，是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。一个人改换名字，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有的人改名乃是兴之所至或情之所动，甚至只是出于标榜自己，其名不副其实的人比比皆是。陶行知先生的改名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，是因为这两个字前后的颠倒反映了他认识论的转变，世界观上的一个飞跃。因此，我们说陶行知先生的改名不是信手拈来的文字游戏，而是标志着他从信仰王阳明到离开王阳明。他在《行是知之始》一文中宣布：“阳明先生说：‘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’。我以为不对：‘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。’”他列举生活常识、自然现象、科学发明的种种事实，有力地论证了这个真理。陶行知先生还表示赞同《墨辩》把知识分为“亲知、闻知和说知”等三种，并在解释“三知”时进一步指出：“我们拿‘行是知之始’来说明知识之来源，并不否认闻知和说知，乃是承认亲知是一切知识之根本。闻知和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。”这里，陶行知先生把行与知的关系，实践与认识的关系，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关系作了正确的说明。陶行知先生还从实践是知识的来源这个命题出发，将知识分为真知识和伪知识。他认为，凡从经验（实践）中发生的知识，便是真知识，否则，就是假知识。他说：“我们要自己的经验做根，以这种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，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，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体部分。”这种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，强调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观点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。

陶行知先生的一贯作风是不尚空谈，注重实践，理论联系实际，顽强地进行探索。早在青年时代，他就意气风发地说过：“我们在教育界任事的人，如果想自主想进步，就须胆量放大，将试验精神，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彻过去，不怕辛苦，不怕疲倦，不怕障碍，不怕失败，一心要把教育的奥妙新理，一个个的发现出来。”陶行知先生认为这种敢于探索新理的精神，就是创造精神。正是这种不倦地追求真理的创造精神，使他一旦发现了真理，就敢于坚持，敢于修正自己先前的理论，并付诸实行，从而发展真理。他的认识论的转变，正是实践、探索的结果。而这种转变对他所创造的“生活教育”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理论是“生活教育”。

从字面上看“生活即教育”只是“教育即生活”的颠倒，就如“行知”是“知行”的颠倒一样。但后一个颠倒标志着陶行知离开了王阳明，那前一个颠倒恰好表明陶行知否定了杜威。在杜威看来，教育只是前人经验的改造，学的是经验，就是学的生活本身，一切从做出发，做什么学什么。这就是实用主义教育。杜威的教育学说是那个时代和那个阶级要求的产物，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，在当时的美国有一定实用价值。但杜威对教育与生活的看法，在教育上是目光短浅的，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。陶行知先生在所有这些方面，都将被杜威颠倒了的重新颠倒过来。他认为，生活既是人们认识的对象，又是人们实践的对象。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际活动，加以改造，并且在改造生活的基础上同时丰富自己的认识，增进自己的新知识并提高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这是教育发展论的新发现。

陶行知先生在《什么是生活教育》一文中说：“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，生活所自营，生活所必需的教育，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。生活无时不变，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。因此，我们还可以说‘社会即学校’。”这个论断是正确的。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，

教育是与社会生活一起产生，一起存在，一起发展的。人们有了生活，也就有教育，教育按照人们生活的需要自然而然地进行着。在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里，没有学校，却有教育。传说中的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，有巢氏教人筑巢为居，嫘祖教人缫丝而织，不正是那时候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教育吗？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发展变化，都给教育带来新的任务和内容，随着阶级的产生，人们的社会生活除了生产斗争之外，还有了阶级斗争。有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，就有反剥削反压迫。于是，生活中除了生产知识的传授教育，也必然存在阶级斗争教育。教育存在生活之中，是由生活决定，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，又反过来推动生活发展。“生活教育”就是生活所原有的教育，在社会上出现了学校教育以后，生活教育依然存在。统治阶级垄断学校教育，可以剥夺劳动人民受学校教育的权利，但无法剥夺他们在生活中、生产中进行教育的机会。陶行知先生说：“自有人类以来，社会即是学校，生活即是教育。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，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，从大众的立场上看，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，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。”生活教育的实际存在，是陶行知先生提出“生活教育”的客观根据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认为，陶行知先生倡导的“生活教育”，并不是他个人头脑的产物，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而是他向社会向群众学习的一个创造。陶行知先生说过：“我的生活教育的思想，大半都是从……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。”

“生活教育”是来自实际生活的一种创造，同时也是符合旧中国的国情的一个创举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，中国的教育家们看不到中国教育的不发达和不平衡，看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，办教育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，未能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去探索自己办教育的途径和方法，而是沿用过时了的旧经验和机械地仿效他国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：“我国兴学以来，最初仿效泰西，继而学日本，民国四年取法德国，近年特生美国热，都非健全的趋向，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。”其结果，教育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，处于半死不活状态。陶行知先生为着改革中国教育，对教育的实际状况作了大量的调查，由乡村到城市，从小学到大学，研究过许多典型材料，从生活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形式和实施办法。他写的《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》、《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》，就是很好的教育调查报告。在地大人多贫穷落后的中国，如果没有适合国情的办法，普及教育只能是空谈。陶行知先生说：“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，大家靠着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，所以生活是穷苦得很”，“我们要在穷社会里找出穷办法来，使一切穷人都得到教育”。

“生活教育”来自生活，植根于生活，为生活所必需，又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。这里，我们想着重指出，“生活教育”在它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新课题，都是由社会实践、人民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。正是实践不断提出的新要求、新问题，推动陶行知先生进行新的探索，取得新的认识，使“生活教育”得以不断发展，不断提高。

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×

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十分丰富，虽然时隔半个世纪，跨越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一个历史阶段，但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我们觉得他那种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，敢于创造的革命精神，特别值得我们认真发扬。陶行知先生对于我国的历史遗产，对于他国的教育学说，既不是一概排斥，也不是全盘照搬，而总是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出发，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其某些合理的成分，为发展我国自己的教育服务。我们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，也应该用历史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，吸取其合于科学的成分，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化教育科学，使之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服务。